

# 矛盾競爭：中國經濟發展區域賽局 ——吳江經濟技術開發區

劉嫻楓

清華大學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

耀眼燦爛、有一種不規則的規範似乎運行著，這是我初次踏上中國的印象。在上海小農村走著，遠遠望去，左手邊是近年來快速建成的新社區，右手邊是滿滿標語的小樓房，到各個出口加工區、經濟開發區進行座談，台商、陸資企業、官員們自信描述與談論著這幾年來經濟發展的快速，閃亮的顏色幾乎要把這些出現的衝突與縫隙給掩蓋住。我們將不因面對快速起飛的經濟發展而迷惑，也不因這些存在背後的問題而忽視這個國家，兩者並存，兩者也不應忽略。

在中國的第五天後，我們到達吳江，在台灣從小陪伴我們的公司標誌出現眼前，坐在大同公司的會議廳中，一方面我們提出問題，一方面我們檢證說法，問題來自於我們的不熟悉，檢證來自於我們前幾天對官員們的訪談。

## 經濟開發重心轉移長三角

中國的經濟開發地區重心，已從舊有的集中珠三角的勞動密集加工產業區位，逐漸轉移至長三角的具有高附加價值的高科技產業，長三角的經濟發展特色，在以珠江三角洲作為前車之鑑的示範，制度規範上以此為基準進行修正，並在產業的取向與資本吸引的過程中，採取與珠三角迥異的途徑。這回田野經驗，我們分別造訪昆山與吳江經濟技術開發區，兩者均處於長江三角洲，因此，如何對外吸引外資進入其開發區，更是不時

上演競爭戲碼。

其次，由上而下的經濟放權中，中央具有「選定權」，中央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選擇」，在政治面上其選擇的過程與高層政治有著非制度性的網絡關係，在經濟面上則形成快速的經濟成長。經濟利益與政治資源通常是不可二分的，不論在極權政體的中國抑或是民主政體的西方國家皆然；但相較於西方民主政體的國家而言，中國的權力形成往往是由上而下選定的過程，「選定」通常具有兩種意涵，一是「差別」的形成，另一則是「連帶」的形成，經濟發展不僅代表當地的經濟繁榮富裕，在另外一方面，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成為政治資源的後盾，一種水平式的地方開發區競爭，在某種程度呈現經濟競爭的樣貌，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特有的政權型態下，經濟發展的過程與結果往往成為政治資源的籌碼與手段。

中國在經濟改革後，社會的不平等問題並沒有隨著市場機制的進入而縮減不平等的距離，相反的，呈現極度的社會不平等。不平等的產生，具有其內部性與外部性的原因，中國的不平等差異是東西的不平等，也是社會階級的貧富的不平等，兩者的不平等恰巧重疊，東邊富，西邊窮。內部性原因在於相較於沿海地區，內陸的經濟功能不強，既無發達的交通設施也無優良的交通區位，而外部性原因則是因政策性因素決定先選定沿海地帶進行經濟發展，因此差異性的政策性選擇，加大了原本即具不平等的經濟差異，因



吳江工廠內的生產線。



吳江紙箱工廠。

此，中國社會更是在內外交錯的差異中逐漸擴大社會差距。

### 中國政府與台商的矛盾關係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與台灣六〇年經濟起飛的發展過程既有相似性，又有其特殊性。就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產業模式，似乎為一段台灣經濟奇蹟的歷史重現。選定產業、給予優惠，扶植企業、出口替代方式，在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進程中，台灣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強大的相似性，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極大部分的台商也曾經是參與台灣經濟發展的一份子。中國政府與台商的互動關係上，有一種雙重矛盾的關係存在。經濟的快速發展，很容易使外界的人們忘記中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所帶來的矛盾，忘記

中國政治體制為基礎運作模式中所產生的問題，權力集中、意識形態、媒體的掌控、非制度性的決策過程。

政治與經濟兩者的關係如此緊密，經濟發展的同時，似乎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集權性出現挑戰，經濟的改革開放是否能為中國政治體制產生轉變，始終是大家不曾忘卻的焦點。

幾天來的行程，緊湊充實，在與每一位台商、官員、陸資企業，甚至是路邊無意間遇到的小姑娘，我都透過他們重新詮釋這個過去我在課本上所不曾瞭解的地方。回台灣後，我還是無法忘記在這田野過程中所經歷的一切，我們始終以一種曖昧的眼光來看待中國時，我處在這兒，這兒告訴我事情，告訴我應該用什麼眼光來看待。當我在上海街頭，這會兒，我終於曉得這是個什麼樣的地方。